



现在病毒已经彻底扩散到世界各地,促使它们变异的条件千差万别,消灭它们必然要难得多,绝非辉瑞等美国公司研制的疫苗迅速就能做到的。要战胜新冠病毒,除了依靠疫苗,世界必须尽快团结起来,采取协调统一的行动。

——环球时报:《人类除非团结起来,否则治不服病毒》

偷摸翻墙,就是公然翻越防疫铁律,翻越法治的围墙。作为高风险人群中的一员,逃跑路上平添了多少疫情传播的风险?为一己之私,置他人生命安全于不顾,不仅缺乏社会责任感,也暴露出法律意识的淡漠。

……对于这些任性逃离隔离点的“逃兵”,必须严肃处理。男子逃离成功,也该引起隔离点监管人员的反思,各防控环节必须填补漏洞和疏忽。

——北京晚报:《围堵病毒的墙翻不得》

要对所有制造不公平的所谓实习、求职服务说不。所有大公司在招募实习生以及进行校招时,都必须坚持公开、透明,择优录用的原则,而不是搞乌烟瘴气的“幕后交易”。这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,也是对企业的长远发展负责。

——北京青年报:《大力铲除“花钱买实习机会”灰色利益链》



## 【本期话题】

### “论文代写”十年不倒

10年前,有媒体曾以《房奴博士一年卖8篇SCI论文》为题,报道一名博士生网上售卖论文。如今,当年30岁的“房奴博士”已变身成为40岁的论文写手,不变的是他开设的“SCI论文小铺”仍在营业。一个博士开网店叫卖论文10年,对此,你怎么看?

## 【议论纷纷】

④海春:俗话说“哪里有需求,哪里就有生意”,论文买卖能够长盛不衰、屡禁不止,根源还在于庞大的市场需求。在巨大的发表压力下,便会有人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,或者迫于现实因素被“逼上梁山”。这说明,遏止论文买卖,关键是在需求端发力,破除“唯论文”的不良导向。

④樊秀娣:要重视基层学术共同体对学者的教学和科研的评价,破除唯论文的学术评价标准,同时要严惩SCI论文买卖行为。

## 【下期话题】

### 药盒里的浪费

制止餐饮浪费,在全社会已经形成广泛共识。实际上,除了“舌尖上的浪费”,“药盒里的浪费”同样触目惊心、令人痛心。“药盒里的浪费”存在多种形式,如个别患者用医保卡购买药品并非法转售给药贩子、大处方带来的不合理用药等。而更普遍的情况,则是家庭过期药品带来的浪费。对此,你怎么看?

# “九个不得” 堵住社区团购的乱源

□蒋璟璟

12月22日,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组织召开规范社区团购秩序行政指导会,阿里巴巴、腾讯、京东、美团、拼多多、滴滴6家互联网平台企业参加。会议对社区团购经营行为划出“九个不得”红线,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不得通过低价倾销、价格串通、哄抬价格、价格欺诈等方式擅自自主定价权。

(12月23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社区团购方兴未艾之际,即遭监管精准设防,于几家互联网巨头而言,职能部门此番近乎摊牌的“指导”,终于让政策的不确定性落地。划出的“九个不得”红线,是紧箍咒,也是场内玩家游戏规则的底线。大家从同一个起点出发,基于同一套框架竞争,这势必能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掉混战。大象打架,蚂蚁遭殃。大型平台企业攻城略地,“碾压市井营生,造成

市场紊乱”这一最坏的结果,或许不会再次发生了。

多年来,互联网企业的“创新创业”,堪称无往而不利。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,无论是云端还是本地,无论是C2C还是O2O,互联网企业的凌厉攻势,可谓摧枯拉朽。“互联网+”“技术赋能”的大旗之下,互联网巨头每进入一个新的领域、新的业态,就会迅速成为龙头、成为赢家。这种“不败神话”,在零售、出租车、餐饮、家电、媒介等行业,均有淋漓尽致的体现。

当互联网企业创造的“神话”,转化为了互联网企业本身的“神化”,事情慢慢起了变化。全社会对于这种“神化叙事”的疑惑与警惕,最终借助“社区团购”这一新事物,得以充分释放。一个有趣的迹象是,近来人们更倾向于以“平台企业”而非以往的“科技公司”,来称呼互联网巨头。这实则传递出一项越发清晰的社会共识:此类公司的

核心商业逻辑并非“技术创新”,而是以资本为驱动、以流量为杠杆的规模经济。

盯上“几捆白菜、几斤水果”的生意,对互联网企业来说,“社区团购”这钱简直是不赚白不赚。之所以能“躺赚”,靠的并不是写出的新算法,也不是新上线的APP、小程序,而仅仅是因为“我足够大”:用户量大、交易量巨大,故而去上游采购生鲜等产品的议价优势大;数据库大、配送队伍大,故而对社区、小区人群终端采购的渗透能力就大……平台已成,大到一定程度,就可以横行,就可以躺赢。毕竟,从巨头晋升到寡头,只有一步之遥。

基于敏锐的预判和显见的风险,“九个不得”旨在从前端廓清社区团购的祸源。打准“烧钱补贴”“低价倾销”“掠夺性定价”的七寸,这既是重申市场规矩,也是为市井民生排雷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,这事关菜篮子的一役,至关重要。

# 要“静音车厢”更要静音意识

□苑广阔

很好地满足了这部分旅客的乘车需求。

而从公共文明的角度来看,“静音车厢”的出现,也是一种提醒和倡导,那就是在公共场所,不管是高铁、动车,还是公交车,抑或是影剧院、餐馆饭店等等,都不应该大声喧哗,即便有彼此交流的需要,或者是需要拨打电话,也应该降低音量,或者是干脆避开人群,找一个不会打扰到其他人的地方。

实际上,以上提到的这些公共场所,很多时候也都有张贴在墙上的告示,提醒公众不要大声喧哗,保持必要的安静。这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礼仪,只是很多人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而已。那么从这角度来说,高铁列车上的“静音车厢”,也算是对充满嘈杂和噪音的公共环境的一种无声的抗议,是“不得已而为之”。问题是,在高铁、动车上我们可以设置专门的“静音车厢”来营

造相对安静的乘车环境,但是在医院、餐厅、饭店等等公共场所,怎么办呢?

既然大多数人赞同在公共场所减少噪音,尽量营造一个安静的环境和氛围,那么我们就不仅仅需要“静音车厢”来屏蔽外部的噪音和干扰,同时更需要我们具备静音意识,也就是即便不在“静音车厢”,也要保持必要的安静。

现在“静音车厢”刚刚推出,我们还不知道其受欢迎程度如何,但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是成立的,那就是选择“静音车厢”的人越多,说明渴望安静乘车环境的人也就越多,延伸来看,既然他们在乘车的时候喜欢环境安静一些,那么在其他公共场所,也必然是同样的要求。所以我们才说,既要有“静音车厢”,也要有静音意识,有了静音意识,才会出现更多的静音环境。

# “对监控喊爸妈”折射出留守家庭的爱与痛

□杨朝清

近日,安徽安庆一段留守女童对摄像头喊爸妈的视频引起关注。女童父母冬至连夜开车9小时,赶回家与女儿团聚。常先生称,公司老板看到视频,给自己放假。

(12月23日 澎湃新闻)

天真、纯净、稚嫩的孩子,对父母的呼唤出于一种本能;渴望父母陪伴、渴望亲情互动的小女孩,对着监控喊出了自己心底的声音。这一幕,触动了人们内心的柔软地带。留守儿童的生计生态,再次引发人们的讨论与思考。

在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当下,“80后”“90后”年轻父母并不缺乏对孩子的关爱。他们或因为“打工人”的身份背井离乡,抑或是双方老人不能成为“老漂族”,再加上幼儿托育机构的稀缺以及“请不起的保姆”等因素制约,致使“隔代寄养”

成为一种“不得不如此”的选择。我们不能先入为主地污名化这些家长“不爱孩子”,而是要读懂他们的爱与痛。更何况,如今作为留守儿童的家长,他们昔日也可能就是留守儿童,对父母“失陪”有着切肤之痛。

一首小诗写道:“春节过后,爸爸妈妈带走了——二月的不舍,三月的思念,四月的春风……”那些缺席的陪伴、亲情的呼唤,总是能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弦。一项调查显示,96%的农村留守儿童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顾,四川、安徽等中西部7省留守儿童占全国总数的69.5%。“对监控喊爸妈”,只不过是留守儿童群体生活图景的一个缩影。

将孩子托付给祖辈,不仅能够节约一些开支,也能够放心安心。可是,隔代寄养不仅容易造成亲情断层,直接影响孩子的家庭认知,还由于祖辈重养轻教和施教不当,导致留守儿童学习状

况令人担忧、心理健康难以保障、亲子关系淡漠疏远等问题。没有得到足够的父爱与母爱,没有得到足够的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的营养输送,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难免会受影响。

在互联网时代,这位“被围观”的小女孩是幸运的,但不是所有的留守儿童都这样幸运,不是所有的老板都这样通情达理。降低城市融入成本也好,促进农民工回流本地也罢,满足留守儿童的精神诉求与情感需要,不能寄希望于小概率的“被看见”“被围观”,而是要通过制度补血的方式让他们能够和父母在一起生活。

关爱留守儿童,除了父母的救赎之外,也需要政府、社会、家庭和学校在良性互动中分担责任。在父母爱的供养的同时,用更多的制度关爱和“大家庭式”的呵护让留守儿童生活上多些保障,心灵上多些温暖,这才是一个成熟社会应有的格调与姿态。



## 联名抵制抄袭者

21日晚,琼瑶、高群书、束焕、王小平、赵冬苓等111位影视编剧、导演、制片人、作家联合发表署名公开信,在冬至深夜向行业和社会发出强烈呼吁:抄袭者不应成为榜样,公开抵制于正、郭敬明出任演技类综艺节目导师,批评最近播出的《演员请就位》《我就是演员》等节目为追逐点击率、收视率,博取观众眼球使用有抄袭劣迹的编剧、导演。

(12月23日《北京青年报》)

## 别让劣币驱除良币

□斯涵涵

联名公开信直指两位文坛名人——于正、郭敬明,均曾被原创者告上法庭,诉其作品抄袭,最终被法院判定侵权行为属实,判决赔偿原创者的经济损失并公开致歉。换言之,二人存在抄袭劣迹,这一点确信无疑。

然而,郭敬明、于正在被判抄袭剽窃后,不但拒不向原作者公开道歉,反而无事人儿一般继续拍戏写作赚钱,最近更是作为“导师”“嘉宾”处于电视节目的“C”位。“劣迹从业者”得到追捧,节目组得到了话题流量,但行业道德、职业规范则被弃之于地。

劣迹者得利且违规成本如此之低,逐利心理或示范效应势必驱使人们纷纷效仿,导致劣币驱除良币。特别是于正、郭敬明拥有不少青少年粉丝,他们的风光“出镜”不仅破坏了社会风气,还严重影响年轻人的是非判断能力。正如联名信所言,吸毒嫖娼的艺人都受到了惩罚,一些有道德问题的艺人也被限制出镜,为什么被法院判定为抄袭剽窃却还能被资本和平台追捧,这种疯狂追逐点击率、流量至上的“审丑”行为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。

尊重知识产权、尊重原创,拒绝抄袭,是影视创作、文学创作的底线,也是优秀文化作品的灵魂,不给抄袭剽窃者提供舞台,停止对这些“劣迹从业者”的宣传炒作,应该是创建文明健康文化大环境的第一步。

## 我们真拿“流量”没办法?

□澎湃社论

针对争议人物的抵制,注定会迎来新的争论。在如今的网络上,有一种质疑可以抛给任何人——你这么做是不是为了炒作为了流量?于正、郭敬明在综艺节目中的言行会被这么问,现在抵制他们的群体也会被这么问。但这可能才是最值得思考的,除了流量,公共空间就没有别的原则需要尊重了吗?

如果说抄袭侵犯的是具体创作者的权益,那综艺节目在娱乐圈的言行和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,影响的则是不特定公众。而就这二人近期频频登上热搜的一些表现看,只能说挺让人遗憾的。正如很多观众表达的感受,这些综艺节目有“利用”这两人争议标签的嫌疑,在刻意制造噱头话题甚至制造分裂。

说白了,这就是赤裸裸的流量导向的大戏。于正和郭敬明在这场流量大戏中,也只是“演员”。这可能也解释了,尽管有这么多人同行、业内人士反感他们,声称要让他们在业内“社会性死亡”,可还是挡不住他们风生水起。因为他们所采用的标准,在流量面前不重要;他们所能调动的资源,在流量引导的资本力量面前不堪一击。

抵制未必全然正确,可是发出不一样的声音,提醒人们任何行业都应该有多元化的标准,也是价值所在。

抄袭是个人的耻辱,抄袭者能混得比原作者好,这可能就是行业的耻辱。这些荒诞的现象,早就应该引起重视,希望业内联名抵制是一个开始。